

新世纪如何认识中国的古典文化

刘志荣

虽然重变、重通,但变不失其常,通有其原则,“贵今”亦绝非拒绝“鉴古”。古典时期确立的一些原则,尤其是其中极为可贵的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经验,可以为后世提供重要的借鉴。就治国理政而言,先秦思想中最可借鉴的是道家和儒家,此二者不但是先秦思想的大宗,也是后世中国文化正统中的重要内容,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启发也最多。

去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人类进入21世纪,也已经过了将近20年,在这个时候,中国学者不免会从各个角度对由新文化运动肇始的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反思。本文尝试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提供一些粗浅的思考与展望。

对于过去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化”,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持有简单机械的单线条的“进化论”式观点了,尤其是,今天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中西”二分的思维框架,太过简单化,西方亦有其“古”,中国亦有其“今”,“古今”之别经常甚至要远大于“中西”之别。在“古今中西”的框架下考虑问题,其思考显然远比简单的“中西”二分乃至对立要更为微妙复杂——后者事实上是简单把中国等同于“古”,西方等同于“今”了,也因此,就容易产生种种比较简单化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要重新树立自己文化上的自信,就绝不可能是简单地“复古”,而是要求思想文化尤其是思维

方式的升级换代。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重新开始深入认识中西文化的核心内容并进行比较、鉴别的可能,正如同某些学者指出的,“促进对中西大传统的深度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新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才可能拥有相对比较深入的根基,也才能出现其21世纪的新面貌,从而真正树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说法,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印证。

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上来看,由于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原发性的强势文化,在历史上主流的文化态度向来是“以我为主”,不失文化上的自主性,引进的外来思想文化新因素,只有经过深入的思考、反刍、转换,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思

想血脉,从而长远发生作用。历史上,佛教思想引入中国就是这样:经过汉魏六朝五百年左右的引进,隋末创立天台宗,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开端;隋唐时期禅宗创立,更开创了独特的中国佛教的道路,融中印文化为一体,不但在当时光辉不可方物,迄今已历千年而余晖犹在,仍被世界人士推为中国文化的独特创造。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引进外来文化、词汇,也仍有这种特点,这与日韩等国比较就可看出:现代日语、韩语引进外来词汇,多是译音之后直接输入,现代汉语就不一样,尽管不乏译音的例证,但主流的态度却是意译——得其本义而重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语言是文化、思维的载体,也可见中国人文化、思维的潜意识里,仍是“化西”而非“西化”。自从明末利玛窦入华,中西文化开始大规模交流、碰撞和融合,迄今也已经过了500年;如果从鸦片战争战败被迫打开国门算起,也已经有175年;在没有大的挫折和弯路的情况下,中国人加深对世界文化的理解,从而

催生新的中国化的现代文化,并非不可想象之事,也许现在正是可以开始的时候。

—

新世纪的新文化,不能不加深对本土文化传统的理解。就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来说,中国古典文化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并且是极少数未曾间断的原发性文化之一,其中的精华部分,足以和世界优秀古典文化相比肩、印证。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新道德,的确不能忽视这一重要资源。

纯粹的中国思想中最有原创性的部分,是先秦思想。先秦思想,现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推称为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文化觉醒期的重要部分。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的命题,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具体来说是公元前800到200年,尤其是600到300年),世界不同地区(中国、印度、希腊、希伯来)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其标志是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

法”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与此同时,这些地区也产生了超越性的宗教。文明的这些进展,标志着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发生过这一觉醒的文化,就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变动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存留下来,否则即使历史上再辉煌,也终究难以避免消亡的命运(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轴心时代各个文化都产生了自己伟大的精神导师,印度有释迦牟尼和《奥义书》的作者们,希伯来有犹太先知,古希腊则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中国的先秦文化,尤其孔子、老子的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轴心时代不同地区对原始文化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以后各个文化的不同形态——由于历史的发展,它们的后裔之间有许多重要差别,但在文化觉醒和超越的轴心时代,虽然这几个地区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但在文化上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雅斯贝尔斯的观察,可以

(下转12版) →

← (上接10版)

的社会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功不可没。论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对中国进步文化策源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是开放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近代以来,北四川路及周边地区,集聚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出版、教育机构,营造出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打下基础。19世纪末,由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向国人介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美理论家、思想家。由“五金大王”叶澄衷捐资创办的澄衷蒙学堂,是由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西式学堂。与中共四大会址仅隔一条淞沪铁路的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译介西学为己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出版机构。在北四川路周

边的弄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用独具个性的方式从事新闻、出版、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传播先进的政治学说、社会理论、文艺思想,为进步文化的产生发展开启民智、夯实基础。1949年,学财务做会计出身的曾联松,在山阴路上的小屋里设计了五星红旗样稿,最终从3000多份投稿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二是街巷纵横、建筑密集的城市空间便利了革命活动的开展。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道路里弄密如蛛网,石库门建筑比比皆是,打开任何一处不起眼的门,都可能发现重要的革命运动旧址、遗址,或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痕迹。老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革命学校,也是一所“弄堂大学”,先后辗转于北四川路附近青云里、师寿坊等处,办学条件异常

艰苦,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领导中央特别委员会,坐镇北四川路安慎坊的中央宣传部;周恩来、赵世炎则于景云里和商务职工疗养院两处前线指挥部靠前指挥,率领工人、学生纠察队奋勇战斗,为起义成功奠定胜局。北四川路周边的数十条马路、成百上千条弄堂,交织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迷宫,进可攻,退可守,为革命和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

三是华洋交错、多头管理的社会环境保障了进步力量的安全。越界筑路区就是“半租界”。在这片事实上的租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沆瀣一气,狼狽为奸,侵害中国领土主权,欺压广大中国人民。但同时,也不可看不到,“半租界”的特殊环境,为中国共产

党人、激进知识分子、进步文化人士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立足缝隙和生存空间。中共四大在这里召开并非偶然。党的重要机关如中央宣传部、中央工农部、上海区委、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纷纷选址北四川路周边地区设立办公地点,同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进步文化人士,曾长期在越界筑路区居住、工作、生活,寻求必要的安全保护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四是舒适便利、优雅宜居的生活环境满足了物质精神的需求。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不仅地价低廉,房租便宜,交通、饮食、购物都十分便捷,书店、影院、咖啡馆众多,无论工作、会友、娱乐都极其方便。鲁迅在北四川路居住生活的10年间,紧张的工作、写作之余,几乎每

个月都要携家人或陪友人去看电影,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内山书店买书、会客。无论电影院还是书店,步行也就是五六分钟,最多十来分钟。换作其他地方,很难想象能有这么方便的生活空间。又如景云里,鲁迅、周建人兄弟与茅盾、叶圣陶、冯雪峰、柔石几家前门对后门,前后左右不过十余步;相似的处境,相同的志趣,为他们沟通情感、交流思想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正是由于具备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思想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民族革命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发展过程中,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为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